

人在负担不起医疗费的情况下只好选择死亡的现象增多。

从世界发展趋势上看,提出“死的权利”,实际上是和晚期治疗中重视人性和自我决定有关,荷兰可以说是“安乐死”的先进国,美国可以说是“尊严死”的先进国,但若将荷兰或美国的做法原封不动地搬到日本,就绝不是明智的做法。荷兰和美国的做法与其国民性、历史、医疗保险制度有关,日本在参考外国经验时,首先应当改善医疗界的情况,提高国民对晚期治疗的理解和关心。

(何培忠摘自 <http://ehrlrich.shinshu-u.ac.jp/tateiwa/1.htm>)

## 日本的“脑死亡”法在 世界上属先进法案

[日]森冈正博

2000年10月,日本迎来了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法后的第三年。2001年,人体器官移植法的修正案很可能会提交日本国会讨论,是继续遵守现行法律的框架,还是放宽限制,可以较容易地摘取人体器官已然引发了广泛的注意。这是关系到我们全体人员生死定义的大问题,有必要在全体国民中进行一次讨论。而且,日本人体器官移植法的修改,已受到了海外的密切关注,因为海外的专家学者之间也在开始重新考虑脑死亡的问题。

日本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是个很有意思的法案,每个人根据遗体捐献登记卡可以预先选择是否将脑死亡视为生或视为死。美国最近两三年也在重新探讨脑死亡法问题,在讨论中提倡的正是日本型的“多元的死亡定义”和在日本得到广泛支持的“违法性阻却论”(在认定人的死亡应是身体死亡的基础上,承认从活着的人身上进行器官移植)。日本现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法很可能会成为21世纪脑死亡法的榜样。

现在广泛流传的一句话是,欧美人接受了脑死亡即人已死亡的观念,而日本人由于其特殊的生死观很难接受这一观念。这种说法其实很令人怀疑。欧美近来对脑死亡问题正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得知,脑死亡问题并没有顺顺当当地得到一般市民的理解。与此相对照,欧美的专家基本上同意大脑死亡,即人进入植物状态就等于死亡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赞成脑

死亡等于人已死亡的美国开始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不承认脑死亡就等于人已死亡的世俗观点,另一方面则是将脑死亡视为人已死亡的专家的看法。

美国遗体捐献登记卡的普及率只有20%左右,多数人不领取遗体捐献登记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对死亡的恐惧,等于过早地宣布了自己的死亡,对器官分配公平性的担心,怕影响葬礼,死后应保持尸体完整的信仰等。目前,许多人并不接受大脑虽然死亡但还有体温之人已然死去的说法,有2/3的人理论上接受,但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实际上,这一结果同日本完全一样。关于感情上接受脑死亡的问题,日本自80年代以后一直在讨论,而美国直到最近才开始正面触及,说美国方面已接受了脑死亡,日本一直阻力很大是毫无根据的,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比较文化的研究。

目前世界上只有两种法律可以选择脑死亡是否等于死亡,一种是日本的人体器官移植法,另一种是美国新泽西州的脑死亡法。1991年,新泽西州以信仰为由,引进了否定脑死亡的“良心条款”,该州有传统的犹太人社区,他们不承认脑死亡即死亡的观点,将否定脑死亡的权利写入法律,也是考虑到犹太人的习惯。该法律规定,只要心跳没停止,即使大脑死亡也应视为生命还在持续,健康保险的支付要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后执行。

据说,该法案在起草阶段时,写入了宗教方面的理由,使人们能够根据伦理方面的信念拒绝脑死亡,但后来出于政治上的妥协,将该理由删去。对此,有的专家指出,“多元化社会”中死的定义就应当体现出真正的多元化,承认按照伦理方面的信念拒绝脑死亡的理由。有意思的是,美国的脑死亡反对论得到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赞同。例如,美国生活联盟一贯反对堕胎、安乐死和脑死亡,本来,由于基督教主张灵魂和肉体是分离的,似乎更应容易接受脑死亡的观念,但事实却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并不接受脑死亡的主张。

以上述情况为背景,90年代以后美国生命伦理方面的讨论,正向新泽西州和日本那样的死亡的多元主义方向转移,而日本却从2000年开始要修改人体器官移植法,其理由据说是日本的法案

在世界上很孤立,应向欧美标准靠拢。笔者认为,日本的这一说法是因为没有真正掌握世界上的最新动向所造成的。

(何培忠摘自日《中央公论》2001年2月号)

## 2000年的美国与亚洲

〔美〕R. 所罗门等

本文主要论及21世纪亚洲地区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作者认为,在未来的21世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仍将在亚洲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与此同时,它们与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必将对整个亚洲地区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美国能否像过去50年那样与亚洲国家继续保持稳定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未知数。整个20世纪的历史表明,在亚洲地区,美国政府几乎无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安全政策。此外,对于美国来说,在日本和韩国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武装力量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未来的国际形势仍然与20世纪极为相似,即亚洲主要国家(如中国和日本)仍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毫无疑问,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与亚洲国家继续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然而,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最终要取决于亚洲地区的稳定。回顾20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洲地区并没有真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纪,20世纪遗留下来的许多重要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例如,日本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历史一直未能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一做法导致东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此外,朝鲜半岛的冷战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中国的领海主权问题(东海和南海)也显得格外突出。应当说,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军事对抗已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除了东亚国家之外,美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微妙的。早在90年代初期,菲律宾政府就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要求美国军方撤走其设置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由于中国领海主权

问题的介入,这一谈判宣告中止,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在这一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它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滞留在东南亚地区。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各自的利益不尽相同,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在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受到来自外界的威胁时,东盟国家几乎不可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识并采取统一的行动。

21世纪即将来临,就亚洲地区未来的国际形势而言,光明的前途与潜在的危险同时并存,关键在于美国和亚洲国家如何面对这一挑战。

(衣 刀摘自英《亚洲纵览》2001年第1期)

## 2000年的韩国

〔韩〕河永出(译音)

对于韩国人来说,2000年是喜忧参半的一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都取得了不同的经济成就和相应的政治成果。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最高领导人的正式会晤,标志着半岛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已寿终正寝。在双边和多边对外关系等方面,韩国也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为其理顺内部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韩国国内的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却并不顺利,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困难。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在2000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可望达到9%(1999年为10%),贸易盈余也将达到100亿美元。与此同时,外汇储备从1999年年末的740亿美元上升到933亿美元。在2000年1~9月期间,韩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低于2.9%。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的一些工业部门在微观经济发展方面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政府不得不在企业、财政、劳动和公共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2000年2月,韩国政府宣布,在这些部门重振经济的计划已进入第二个阶段,其目的是在年底之前实现改革的最初目标,随后便将重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竞争力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的付诸实施并不是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市场参与者的积极努力来逐步实现的。

金融改革 韩国金融改革的目的是加速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市场化进程。政府将采用一系列